

保生大帝民間崇拜與兩岸同源性探究： 基於結構建構主義的歷史考察

鄭寬，王孟筠¹

摘要：台灣省台南市學甲慈濟宮每年舉辦的“上白礁”謁祖祭典（保生大帝信仰）是由漳州傳入，寓意為遙祭對岸大陸祖先，在台灣代代相傳已經 350 餘年。其祭祖活動有其特殊性，深具時間深度與歷史性，並與閩台地方開發史有密切關係，也是兩岸同根同源的最有力見證。從結構建構主義理論的角度看，上白礁謁祖祭奠同屬兩岸的共有知識，對作為單元主體的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的身份和利益具有塑造作用，一方面，對塑造兩岸的中華民族認同身份具有推動作用，另一方面讓兩岸具有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身份和利益的塑造對兩岸形成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社會結構具有建構作用，這也將推動兩岸早日實現和平統一。

關鍵字：結構建構主義，上白礁謁祖祭典，保生大帝

Exploring the Worship of Baosheng Dadi and the Homology betwee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 A Historical Study Based on Structural Constructivism

Abstract: The “Shang Baijiao” Ancestor Worship Ceremony (belief in Emperor Baosheng) held annually at the Xuejia Ciji Palace in Tainan City, Taiwan Province, originated from Zhangzhou and symbolizes the remote worship of ancestors from the mainland across the strait. This tradition has been passed down for over 350 years in Taiwan. The ancestor worship activity possesses unique

1 作者簡介：鄭寬，貴州省遵義市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史博士生；(Zheng Kuan, from Zunyi, Guizhou Province,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in Chinese history at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王孟筠，台灣省台南市人，東海大學政治學博士，廣西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Wang Mengyun, from Tainan, Taiwan Provinc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ffiliated with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supervisor. She obtained the Ph.D. degree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unghai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profound historical depth, and a close conne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Fujian and Taiwan regions, serving as a powerful testament to the shared roots and origins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constructivism theory, the “Shang Baijiao” Ancestor Worship Ceremony constitutes shared knowledge betwee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shaping th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of China’s mainland and Taiwan as unit subjects. On the one hand, it promotes the shaping of a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cross the strait. On the other hand, it fosters inseparable common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shaping of identity and interests plays a constructive role in forming a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which will also facilitate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across the strait.

Keywords: Structural Constructivism, Shang Baijiao Ancestor Worship Ceremony, Emperor Baosheng

一、結構建構主義的理論內涵

結構建構主義即溫特建構主義，儘管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自 20 世紀 80 年代末出現以來，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流派，但根據亞歷山大溫特的分類方法，結構建構主義是以理念主義為本體論，整體主義為方法論的一種建構主義流派。與其他建構主義理論流派一樣，結構建構主義認為社會結構與施動者之間為相互建構，不存在單向的因果關係。國際社會的結構也是由國際關係行為體在互動中建構而成，國際社會的結構也會反過來影響其包含的國際關係行為體。在結構與施動者的互動過程中，觀念的力量是主要的，社會結構主要由觀念所決定，而觀念也會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從而決定行為體的行為。與其他激進建構主義流派不同的是，結構建構主義也承認物質力量的作用，但需要通過社會性結構才會有意義。此外，溫特也接受了現實主義的假設，即承認國家為國家關係的主要行為體。

二、上白礁謁祖祭典的產生與發展

（一）保生大帝信仰的產生

保生大帝原名吳本，乃是北宋閩南之地的一位民間神醫，出生於宋朝太平興國四年（公元 979 年），他的故鄉位於現今漳州市龍海縣角美鎮的白礁鄉積善里。吳本一生致力於醫學事業，以高超醫術和悲憫情懷救死扶傷，深受百姓敬愛。

流傳下來的一個典故講述了宋仁宗的母親身患乳疾時，吳本挺身而出揭下皇榜，成功治愈了太后的疾病，贏得了皇家的尊崇。然而在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 1036 年），吳本為了採集草藥救治急症患者不幸遭遇意外，從青礁的大雁東山墜落山谷，終年 58 歲。因其

高尚醫德與精湛醫術，鄉民們對其懷念不已，將他奉為神祇，建廟塑像，並被後世朝廷敕封為“大道公”、“保生大帝”。

宋仁宗下令將供奉吳本的白礁龍湫庵改擴建為壯觀的三進五門二層宮殿式建築，自此以後，保生大帝信仰在歷朝歷代中不斷發展，其廟宇遍佈閩南各地，並隨著移居台灣的先民傳播至台灣，成為兩岸民眾共同尊崇的醫神。如今，在泉州、漳州、廈門以及台灣等地有多處供奉吳本的廟宇，如廈門青礁龍湫庵、漳州白礁醫靈神祠、廈門吳西宮、泉州花橋慈濟宮等，都是信徒表達對保生大帝虔誠敬仰的地方。

地理上，福建與台灣雖僅相隔約一百八十公里的台灣海峽，但在古代交通條件極其艱難的時代，橫渡海峽的過程中必須面對險惡的“黑水溝”海域，此段海域將近 60-70 海里，這段凶險航程給移居台灣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台灣志略》曾記載那令人膽寒的“黑水溝”：“黑水溝為澎廈分界處，廣約六七十里，險冠諸海，其深無底，水黑如墨，湍激悍怒，勢似稍漚。舟利乘風疾行，亂流而渡，遲則波濤衝擊，易致針路差失。”² 而《諸羅縣志》則描述海上台風和颶風的凶猛：“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為台，颶常驟發，台則有漸。颶或發而倏止，台則連日或數日而止。……船在洋中遇颶猶可為，遇台則不可當矣。”³ 因此，移居赴台前常會攜帶家鄉守護神像，如保生大帝，祈求庇護旅途平安。抵達台灣後，他們會在新的居住地建立同鄉組織，並建造家鄉神廟，作為精神寄托和活動中心⁴，其中保生大帝廟宇的地位尤為重要。這也使得保生大帝的信仰不僅深深植根於閩南本土文化之中，更伴隨先民遷徙的腳步，成為了台灣民間重要的鄉土保護神。

在南明永曆十五年(公元 1661 年)鄭成功領導的軍隊展開了對台灣的戰略性跨海行動，旨在驅逐占據寶島的荷蘭殖民勢力。這支遠征隊伍的不僅有許多英勇善戰的軍士，也有許多來自福建沿海地區的居民，其中有一支特別的群體源自保生大帝信仰的發源地——當時的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白礁鄉積善里(現今歸屬福建省漳州市龍海市角美鎮)。在這支隊伍中，一位名為李勝的百姓秉持虔誠信仰，特意從家鄉的白礁慈濟宮請來了保生二大帝以及合祀的謝府元帥、中壇元帥等三位神祇的神像，作為部隊航行及登陸作戰的守護神靈。

鄭成功麾下將領陳一桂所率領的軍民在所請神明的庇佑之下，選擇在農曆三月十一日這個特別的日子，在未駐紮荷蘭守軍的學甲將軍溪河畔一個名為“頭前寮”的地點順利實施安全登陸。登陸後的軍隊駐紮穩定後，進一步向內陸的學甲地區挺進，並積極展開了屯

2 (清)王必昌：《乾隆重修台灣縣志》卷之二，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刊本。

3 (清)陳夢林：《康熙諸羅縣志》卷之一，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刊本。

4 范正義：《保生大帝信仰與閩台社會》，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2 頁。

墾活動。這些早期移民隨後廣泛分佈到了學甲、大灣、草寮、溪底寮、西埔內、山寮、倒風寮等多個區域，他們以艱苦卓絕的精神開墾土地、建設家園。這些先民們在學甲李姓聚居的下社角設立臨時草棚，供奉著伴隨他們一路征戰的保生二大帝及其他兩位神祇的神像，這一舉措象徵著他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精神支柱與文化傳承。由此，這三尊神像在學甲地方被尊稱為開基二大帝，成為了當地社群團結與信仰中心的源頭，也見證了鄭成功收復台灣壯舉中的民間信仰與文化融合的一面。

台灣台南市學甲區的慈濟宮，名列三級古跡，其歷史可追溯至清代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據《諸羅縣志》卷十二雜記志“寺廟”條所載，“慈濟宮”原名“保生大帝廟”，位於縣治西門外，由當地耆老募資興建，以祭祀保生大帝為主神。⁵這一記載為我們提供了慈濟宮早期歷史的重要線索。慈濟宮的沿革與台灣移居社會緊密相連。早期閩南漢人移民以台南為主要目的地，他們跨海而來，不僅帶來了故土的文化和傳統，也帶來了對神明的信仰和崇拜。保生大帝作為閩南地區的重要醫神，在移民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因此，當移民在台南地區定居後，他們便積極籌建廟，供奉保生大帝神像，以祈求神明庇佑和庇護。慈濟宮的興建，正是這一歷史背景的產物。據慈濟宮於1929年所立的“慈濟宮沿革碑記”所述，該宮自康熙時代起已有268年歷史。當時，學甲村落尚屬初創階段，居民稀少。先有李姓人家從福建白礁攜眷來台，並迎請前三座神像同渡。他們最初在學甲下社角建起草庵供奉神像，後因保生大帝神威顯赫、香火旺盛，遂於康熙四十年改建為堂皇的廟宇。這一歷史沿革不僅與近代閩南居民赴台移居史相吻合，也為我們揭示了保生大帝信仰在台灣傳播的歷史情況。

保生大帝信仰在台灣傳播與閩南漢人的移居和開發活動緊密相連。移民們將保生大帝視為守護神和醫神，為了免於疾病、災害等困擾向其祈求庇護和幫助。隨著時間的推移，保生大帝的信仰逐漸在台灣南部地區紮根並擴散開來。廟宇的數量也由南向北逐漸遞減，反映了閩南漢人移民在台灣開發活動之先後順序。目前，台灣（包括金門、馬祖和澎湖列島）供奉保生大帝的廟宇約有三百餘座，其中台南市就有九十多座，占了全台保生大帝廟宇數量的近三分之一。這一數據不僅表明保生大帝信仰在台灣廣泛傳播和深遠影響，也為我們提供了研究台灣民間信仰和移居社會歷史的重要線索。慈濟宮的歷史沿革和保生大帝信仰的傳播是台灣移民社會歷史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不僅揭示了閩南漢人移民在台灣開發活動的歷史背景和過程，更是說明了台灣自古以來就和大陸血脈相連，同為中華民族之血肉和精神共同體。這是我們理解和研究台灣民間信仰、文化傳承和社會變遷的重要視角和線索。

5 （清）陳夢林：《康熙諸羅縣志》卷之十二，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刊本。

（二）上白礁謁祖祭典的內容與過程

在海峽兩岸的傳統節慶活動中，每逢農曆三月紀念保生大帝誕辰之際，兩地均會如期舉行莊重且盛大的祭祀慶典。其中，位於台灣台南的學甲慈濟宮以及福建省漳州角美鎮白礁村的白礁慈濟宮祖廟作為保生大帝信仰的重要源頭，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緊密的兩岸文化信仰聯繫。白礁慈濟宮不僅是保生大帝信仰在閩台地區的祖庭，更是中國大陸首批被列為涉台文物之歷史文化遺產。

追溯歷史，源自清代的“上白礁”謁祖祭典具有深遠的文化傳承意義。“上白礁”這一儀式象徵著台灣特別是台南學甲地區信眾回歸精神故土——福建泉州白礁慈濟宮祖廟進行朝聖與祭祀。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由於橫跨台灣海峽的航行風險增加、地理距離遙遠，尤其是在日本侵台時期的特殊背景下，民間交往受到極大限制，直接前往大陸白礁祖廟進行祭祀活動變得極為困難。因此，自那時起，台灣人民調整了祭祀方式，選擇在每年農曆3月11日這個特定的日子，在當地頭前寮舉行“請水”儀式，以此遙祭對岸的福建白礁慈濟宮祖廟，並且這一獨特的祭典形式已經在台灣地區持續了超過三百多年。至晚在清朝道光末期，現今所見的“上白礁”謁祖祭典已形成較為完整的儀式體系，其包含的繞境巡遊、陣頭表演以及請水儀式等諸多環節皆已制度化並頗具規模，彰顯出兩岸信眾對於保生大帝深厚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認同。通過這樣的年度祭祀活動，不僅傳承了古老的傳統習俗，也進一步增強了海峽兩岸人民之間的情感紐帶和文化互動。

學甲慈濟宮的祭祖活動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其中一項尤為矚目的便是“蜈蚣陣”儀式表演。據口述傳統記載，學甲後社角蜈蚣陣之“蜈蚣公”被視為青龍神的化身，受神明之聖旨輔助保生大帝，事迹卓著，從而被正式冊封為大帝的護法神祇。蜈蚣陣之形式遵循“龍頭鳳尾”的寓意，由十八塊精心雕琢的木板組裝而成，結構獨特，蘊含深邃的神話內涵。

在每年舉行的上白礁祭典中，蜈蚣陣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整個祭典儀式的核心組成部分，還引領著參與廟宇與神壇的龐大陣容，數量時常達到七八十座之多。伴隨蜈蚣陣一同出巡的各式藝陣豐富多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孩童出演的“藝閣”表演，這種被稱為“抬閣”的藝術形式在清代即已盛行，起初以人力抬舉或牛車承載展示，如今則發展為裝飾華麗的車載藝術。其中，藝閣的主題內容廣泛取材於唐宋時期的傳奇歷史故事，包括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隋唐演義、白虎戰青龍、薛剛鬧花燈、郭子儀大戰安南國、狄青押軍衣、五虎平西、五虎平南、狄青對決八寶公主、水滸傳以及岳飛傳等共計十三部經典劇目。而每年演出的劇目並非固定，而是通過擲筊的方式神聖決定。值得注意的是，學甲上白礁祭典中的蜈蚣陣，由後社集和宮專門負責裝閣設計制作，堪稱

台灣西南五大香科活動中僅存的人力扛抬蜈蚣陣實例，這既體現了對傳統的堅守，也展現了極高的社區凝聚力和人力之組織能力。這些承載著傳統文化基因的戲劇演繹，傳遞了儒家推崇的忠君愛國、崇尚正義、恪守倫理道德的價值觀，使得祭典活動成為弘揚中華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使每一位參與者都能深深感受到這份根植於血脈深處的文化認同。

上白礁謁祖祭典是一個層次分明且充滿莊重禮儀的大型祭祀活動，可分為兩個核心環節：

首先，在祭典的第一階段，參與者們遵循古老的禮儀流程，前往設在將軍溪畔白礁亭附近的“鄭王軍民登陸暨上白礁謁祖紀念碑”，在此舉行莊嚴的祭祖儀式。儀式開始時，將神位恭迎至供桌，依照傳統步驟依次進行上香、獻供品，並由所有在場信眾向中華民族共同的列祖列宗行三次深深的鞠躬禮，隨後祭文朗讀、化疏祈福、燒祭紙錢，最後送神歸位並撤除供品，從而圓滿完成了對中華民族先賢的崇敬祭拜。緊接著進入祭典的第二階段，是對位於福建白礁的慈濟宮祖廟進行遙拜。⁶ 伴隨著誦經團莊重的“祝壽贊”詠唱，再次按照規範的禮儀進行上香，分別呈獻鮮花、鮮果以及財富等供品。此時，主持者會宣讀致祖廟的表文，並率眾向左面朝拜白礁慈濟宮祖廟，虔誠地行三跪九叩之大禮，以此表達對祖源地的深切懷念和對中華民族傳統精神——慎終追遠、傳承不息的堅定信念。

每年的上白礁祭典活動期間，除了在學甲和中洲兩地的主要區域內進行香陣繞境外，當舉行更大規模的刈香活動時，祭典的輻射範圍會擴展為為期三天的廟會式遶境，覆蓋範圍甚至超越了舊時“學甲十三庄”的地域界限，直至今日學甲全區。而在每次遶境過程中，必有一個非學甲慈濟宮直接受祀區域的庄頭會被穿越，這個特別的環節被稱為“過堡”，寓意著祭祀隊伍跨越了清代學甲堡原有的行政邊界，展現出信仰力量的無界傳播和共享。

遙祭祖廟儀式的尾聲環節中，“請水火”儀式承載了深厚的文化傳承與歷史記憶。這一過程旨在強化參與者對根源的敬仰與追憶，特別是對祖先跨越台灣海峽、從大陸遷徙而來的艱辛歷程表達“尊本思源”的思念之情與崇敬之情。對於參與儀式的十三庄社群來說，這一環節不僅是對鄭成功部屬登陸地點——將軍溪畔頭前寮的地理標識致敬，更是對自身信仰源頭保生大帝的深切而莊嚴之追溯。

在嚴謹莊重的法儀中，法師首先來到將軍溪畔，遵循古法施行咒語，啟用五營竹符以召喚並整合五營神兵神將的力量。隨後，法師虔誠地從溪水中舀取聖潔之水，盛入香擔之中，並借助“保生大帝請水敕封”的符籙，將這份象徵生命源泉與血脈相連的溪水神聖封存。緊接著，“請火”儀式啟動，法師手捧熾烈燃燒的炭火爐，與爐主共同邁著象徵五行方位的“五

6 黃有興：《學甲慈濟宮與壬申年祭典紀要》，《台灣文獻》，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第46卷，第4期（1995），頁103220。

方步”形成一種精神力量與現實空間的交融。熾熱的火種被小心翼翼地移入香擔的另一端，同樣以符令封緘，寓意香火不斷、世代傳承。整個“請水火”流程完成後，不僅標誌著祖先精神得以薪火相傳，亦象徵著地方社群文化的延續和保護，從而確保祭祀活動得以完整與和諧，達到祈福消災、慎終追遠的深遠意義。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台灣社會確實出現了一股強烈的尋根熱潮，許多台灣民眾希望通過回溯歷史淵源，強化與中華民族文化和傳統的聯繫。上白礁謁祖祭典作為一項歷史悠久且富有象徵意義的民俗活動，在這一時期開始受到了更為廣泛的關注、重視和參與。該祭典源自對保生大帝信仰的傳承，通過祭祀活動表達對祖籍地及中華傳統文化根源的懷念、熱愛與尊崇，體現“飲水思源”的深厚情感。隨著這股熱潮的推動，學甲慈濟宮在 1978 年於頭前寮將軍溪畔建立了“鄭王軍民登陸暨上白礁謁祖紀念碑”，進一步鞏固了這一祭典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影響。1980 年，上白礁祭典的規格得到提升，成為市級祭典，標誌著官方對其文化價值的認可和重視。至 1981 年，當地還特別設立了白礁亭，以便更好地舉辦此類謁祖祭典活動。上白礁祭典不僅在台灣當地具有重要意義，也是連接兩岸閩南文化的重要紐帶，成為了展現中華文化血脉相連、世代相傳的重要載體之一。通過這樣的民俗活動，兩岸同胞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進彼此的情感聯繫和文化認同感。

三、結構建構主義與保生大帝崇拜信仰的內在邏輯

（一）保生大帝崇拜信仰作為共有知識的作用

結構建構主義認為，社會結構是由不同的行為體在互動之中所建構，社會結構是觀念的分配，即社會共有知識，以習俗、文化的形式內涵於社會結構當中，並決定著社會結構的性質特徵。社會結構也同時會作用於行為體，界定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從而影響行為體的互動方式和政策走向。在社會結構和行為體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兩者並不存在單向的因果關係，兩者互為因果。行為體在互動的過程中，會加深對共有知識的內化，從而強化在體系結構內的身份認同或利益導向。在結構建構主義看來，對於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省的整個中國社會結構來說，是社會意義上的結構，是觀念在大陸和台灣兩個單元之間的分配，上白礁謁祖祭典作為兩岸共同傳承下來的傳統文化和歷史記憶，作為共同的信仰成為大陸與中國台灣的紐帶，使得其成為兩岸共同“觀念”的一部分，分佈於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兩個單元當中，內涵於作為整體中國的社會結構。從這一點來看，可以從兩個因素來理解：

首先，對保生大帝的祭奠和崇拜，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發展到了當下已經有著規範和明晰的儀式規則與流程，較為完善和統一的文化要素體系，以及具有一定規模的物質載體，

這已經在一定的空間範圍內成為兩岸的共有知識，而兩岸之間的共有知識作為中國整體社會結構的根本，是大陸和台灣對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解和期望，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其在兩岸整體的社會結構這個特定環境之下，對大陸和台灣身份認同和利益認知的建構具有決定作用。保生大帝信仰及上白礁謁祖祭典所包含的祭祀體系、文化物質載體和思想體系，作為兩岸同根同源文化，在傳承和互動交融過程中，已融入閩台兩岸人民的生活，呈現堅定的民族情感，並借由“蜈蚣陣”、“請水火”、“安五營”、“過火”、“香陣繞境”、“過堡”等祭祀圈形式，呈現閩台兩岸人民的中華文化認同。對於共同“祖源”的追思及兩岸同宗血脉的“族源”記憶，⁷成為了兩岸人民較為牢固的共有知識，這種牢固的共有知識已經在兩岸各自一定的空間範圍之內發揮著作用，這也將推進對台灣對於自身作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身份建構，也推動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在建構，使得台灣的利益建構與行為向著有利於實現統一的目標發展。

其次，對於有利於中國統一的社會結構來說，建構的前提便是社會實踐，即大陸和台灣之間不斷地互動，在互動中產生社會結構。從歷史維度來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在對保生大帝的信仰以及上白礁謁祖祭典方面兩岸總是交流不斷，在每年的農曆三月保生大帝生日之時，在大陸福建的白礁慈濟宮祖廟和台灣省台南市的學甲慈濟宮都會舉辦祭祀慶典，隨著上個世紀 90 年代陸台之間的交流增多，兩岸的文化交流也逐步開始，尤其是 2000 年之後，兩岸之間的文化交流全面展開，兩岸圍繞著對保生大帝信仰之間的精神交流也更為頻繁，每年均有台灣的保生大帝信眾來到大陸漳州的白礁慈濟祖宮謁祖祭拜，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台灣的保生大帝信眾也不忘通過互聯網對保生大帝進行“雲上祭拜”，並與大陸方面進行相應的文化交流活動。台灣與大陸就有關上白礁謁祖祭奠所進行的系列互動，正是作為社會實踐對有利於中國和平統一的結構進行塑造，這也是結構存在和轉化的條件。⁸ 只要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就兩岸文化互動的邏輯不變，那有利於統一的整體中國結構也會持續穩定的得到發展。

（二）兩岸結構對兩岸本體的塑造

從本體論的層面來看，雖然結構建構主義承認一定的物質性因素是客觀存在的，但其本質上仍是理念主義，即結構是行為體觀念的分配，結構可以建構起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從而決定行為體的政策和行為，即使結構存在物質性因素，這些物質性因素也需要通過結構的社會意義才能夠發揮作用。在兩岸就保生大帝信仰進行互動的過程中，雙方圍繞著包

7 郭學松：《記憶、認同與共同體：兩岸宋江陣演武文化中民族傳統體育身體展演與話語敘事》，《體育科學》2020 年第 7 期，第 79-87 頁。

8 陳岳，田野：《國際政治學學科地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4 頁。

括上白礁謁祖祭奠在內的一系列保生大帝信仰文化符號所形成了一定的共有知識，從而在一定範圍內造就了有利於中國統一的社會結構，行為體與結構相互影響，相互構造，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保生大帝信仰及所屬相關的所有文化符號，作為兩岸在互動中共有知識形成的載體，是行為體與結構互構關係的核心，成為兩岸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關鍵要素，而這一關鍵要素正是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社會結構塑造的關鍵。在對兩岸社會結構進行動態塑造的過程中，結構也在對兩岸的身份和利益進行建構，對保生大帝信仰等一系列所屬中華文化體系所形成的共有知識載體，兩岸在互動的過程中逐步產生了“中華一家親”的共有知識，其所形成的動態結構也會逐步讓台灣意識到自己本身為中華民族一部分的身份，從而有著盡快實現祖國統一的利益，雖然“意識到”與“建構”對於身份的自我認知來說有著較大的區別，但是基於台灣自 1894 年被日本帝國主義從祖國的懷抱中分離出時，其政治、文化、歷史、民族等觀念不斷被日本殖民政府及其之後的統治當局所刻意塑造和建構，從而應當再次從正視歷史的角度對其再建構，使其將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共有知識持續內化，“意識到”自古以來其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三）兩岸互動對兩岸結構的建構

結構建構主義認為在體系結構對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產生建構的同時，行為體也在互動的過程中對結構產生建構作用，互動的過程產生了行為體的共有知識，共有知識塑造了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當行為體有了對自身利益和身份的再認知時，就會決定行為體的政策和行為。在行為體互動的過程中，共有知識的內化程度越深刻，其所建構的結構也更加穩定，這種穩定同時體現在空間和時間兩個層面上。兩岸對保生大帝的民間崇拜信仰及其有關的文化規範，成為了兩岸互動的文化紐帶，在兩岸舉行的一系列謁祖祭典的活動中，作為兩岸共有知識的保生大帝及其相關的一系列文化符號對兩岸也更加深刻和穩固，其中一些信仰文化也逐步轉化為了制度規範，使得文化紐帶更加牢固，兩岸的互動與交流也使得保生大帝的信仰文化在空間上傳播更廣，即作為文化符號和要素的共有知識在空間範圍內對兩岸的影響也在逐步加深，這決定了謁祖祭奠文化對建構兩岸人民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也在不斷的拓展和深化。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同時作為施動者，互動所形成基於整體中國的結構受到多方面的影響，但來自其內生文化的影響不容忽視，保生大帝的信仰崇拜及其相關的文化活動作為傳統內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鮮明的中華傳統文化印記，足以連結和契合兩岸人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天然追尋，對於形成兩岸人民的中華民族認同及共同體意識有著強烈的推動作用，從而形成一種有利於中國統一的兩岸關係結構。每個人自出生以來就具備自身的血緣特徵和地緣特性，這樣的血緣特徵和地緣特性所體現出的具

體要素就是所伴隨的信仰、道德、習俗、心理狀態等內容，雖然這一系列單元要素有著比較鮮明的先驗特徵，但從時間維度來看，“先驗”的單元特質也是受著過去行為體互動的影響，在互動的過程當中形成了觀念的分配，具備歷史性的特點，而從當下來看，這些“先驗”的單元特質也決定了未來行為體之間互動，以及行為體與結構互構的發展方向，成為行為體和社會結構未來發展的“基本盤”。

四、構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結構的建議

（一）提升保生大帝民間崇拜文化的知名度

保生大帝民間崇拜及上白礁謁祖祭奠的相關文化作為兩岸的共有知識，對建構有利於兩岸統一的社會結構具有積極作用，所以，兩岸有意識的加強和擴大保生大帝民間崇拜的影響力是很必要的。當然，保生大帝民間崇拜涉及到民間信仰的問題，中國大陸地區堅持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對於宗教的傳播也有明確的法律限制，所以在擴大保生大帝影響力的問題上，需要明確的問題是這並不是傳播信仰，而是通過文化宣傳、歷史敘事傳播及旅遊景區建設的方式來提升其知名度。當然，鑒於目前兩岸的各方面形勢，這一工作需要大陸官方牽頭或協調兩岸的民間力量來共同完成，在大陸方面，應當努力使得保生大帝民間崇拜及上白礁謁祖祭奠相關文化的知名度突破福建省範圍，通過傳媒宣傳、舉辦活動、商業合作等形勢擴大保生大帝民間信仰文化的知名度，提升更多大陸民眾對保生大帝民間崇拜及相關文化的認知。在台灣方面，鑒於目前島內的政治形勢，其官方層面願意同大陸政府推行保生大帝民間文化宣傳的知名度較低，而民間力量相對分散，且資源和力量有限，所以具有可操作性的方式是由大陸牽頭或引導，通過資金、技術及信息支持等方式，提升台灣民間力量對保生大帝民間崇拜的宣傳能力，由此培育保生大帝及上白礁謁祖祭奠作為共有知識在台灣地區的影響力。在宣傳的形式方面，兩岸雙方除了借助傳統媒體、文化活動等形式擴大保生大帝民間信仰的知名度以外，也應當借助自媒體、大眾應用軟件、虛擬實境（包括 VR 或 AR 技術）來加強兩岸範圍內的保生大帝民間信仰文化的宣傳，可以由大陸官方牽頭具備高新技術宣傳能力的公司參與到這個過程中，在擴大保生大帝民間信仰文化空間範圍的同時，也在兩岸不同年齡階段，尤其是廣大青年群體中傳播，使其影響力擴大受眾範圍。保生大帝及上白礁謁祖祭奠的相關文化作為有利於建構兩岸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結構的共有知識，其傳播對塑造兩岸的文化身份認同、建構兩岸共同利益有著較大的推動作用，雖然在進行兩岸身份和利益的認同建構過程中有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但對保生大帝民間崇拜及上白礁謁祖祭奠文化在兩岸人民心目中知名度的提升對促進兩岸文化統

一，建構兩岸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作用無疑是積極的。

（二）培育兩岸中華文化共同體意識

大陸和台灣自古以來就具備共同的文化特徵，這樣的文化特徵基於大陸與台灣的地緣特徵，並經由兩岸交流的歷史發展而形成，而共同的文化特徵主要指中華傳統文化。保生大帝民間信仰及上白礁謁祖祭奠的相關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在兩岸都代表著中華文化的元素，尤其是在當下的台灣，經過了現台灣當局對其歷史文有意識的錯誤敘事之後，重新構建了台灣人記憶中的文化特徵，這些錯誤的文化特徵同樣作為共有知識的一部分，對中國而言帶有較強的離心作用，阻礙兩岸實現統一。培育兩岸中華文化共同體意識是需要兩岸雙方所進行的一個更高層面的行為，比之於就保生大帝民間信仰崇拜的敘事對兩岸關係結構進行建構，更為宏觀和抽象，涉及到的要素也更廣，且持續的時間更長。所以，培育兩岸中華文化共同體意識對於當前的兩岸關係工作是很必要的。推動中華文化共同體意識的建構，同樣是基於共有知識在結構建構進程中的核心作用，促成一個有利於中華文化持續發展和生長的環境建構，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包括保生大帝民間崇拜及上白礁葉祖祭典的中華文化要素在兩岸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中都有利於得到更好更快的發展，從而更有利於作為共有知識對有利於兩岸統一與和平發展的社會建構進行建構，形成一種正向循環。當兩岸對培育中華文化的共同體意識進入了制度化、常態化、慣例化之後，則兩岸的民眾就會對中華文化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更為牢固的認同，有利於兩岸和平統一的社會結構也會逐步鞏固，從而對兩岸各自的身份與利益的建構也會向著構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方向發展。具體的做法，還是應當由大陸的官方牽頭，聯合起大陸的民間力量和台灣的統一力量來穩步推行，如拓寬和舉辦兩岸的傳統文化交流活動，加深建立民間傳統文化的溝通交流機制，擴大各層次招收台胞學生的指標，加大有關中華傳統文化的影視劇、紀錄片的合作，並積極運用現代傳媒方式，在自媒體、社交平台、應用軟體等方向上開發和傳播中華傳統文化。除此以外，兩岸的民間力量也應該緊密合作，民間力量的合作可以規避掉官方介入所帶來的一些敏感問題，在形式和內容方面也可以更加靈活，可以就如何宣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問題在影視、戲曲、學術等方面採取多種方式的交流與合作。

作者聯繫方式：

郵政編碼及通訊地址：325035 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珞喻路 152 號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鄭寬

聯繫電話：18085279655

電子郵箱：345591903@QQ.com